

胡适文集

中国思想史

下

胡适◎著



简单说来，思想是生活种种的反响，社会上的病态需要医治，社会上的困难需要解决，思想却是对于一时代的问题有所解决。经济对思想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在近两三百年来，经济极为重要。生活的方式生产的方式，往往影响于思想。



胡适文集
HU SHI WEN JI

中国思想史

(下)

胡适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思想史 / 胡适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9

(昨日芳菲: 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丛刊)

ISBN 978-7-5581-2914-8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思想史—中国 IV.

①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5798 号

中国思想史

著 者 胡 适

策划编辑 杜贞霞

责任编辑 齐 琳

封面设计 老 刀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字 数 459 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9584388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2914-8

定价: 96.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编 先秦两汉诸子哲学	1
说 儒	3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83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106
《墨子·小取》篇新诂	113
汉初儒道之争	138
王充的哲学	142
第二编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167
第一章 齐学	169
第二章 杂家	196
第三章 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	226
第四章 道家	254
第五章 淮南王书	272
第六章 统一帝国的宗教	331
第七章 儒家的有为主义	366
第三编 中国中古思想小史	409
第一讲 中古时代	411
第二讲 齐学	413

四、政治思想

《淮南书》的政治思想，虽然处处号称“无为”，其实很有许多精义，不是“无为”一个名词所能包括。约而言之，此书的政治思想有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地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故常。

虚君的政治是无为主义的意义，我在前几章已屡次说过了。《主术训》说：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重为惠，是不轻于施恩惠，要不轻施惠，如不轻为暴一样）。

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而死之，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

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怨（原作怒，依下文改）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故太上，下知有之。

“尸”是祭祀时扮作受祭的人。他扮作祖宗的样子，俨然玄默，寂然无为，而受大众的祭祷。《诠言训》说此意更明白：

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

弗为也；弗能，无亏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无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左（古时车上有三人，君在左，仆御在中，勇士在右）。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

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虚君之政治，君主不但不轻于为暴，并且要不轻于施恩惠。必须能“重为惠，若重为暴”，然后可以做到慎到所谓“动静无过，未尝有罪”，立宪国家所谓君主不会做错事，即是此意。老子所谓“太上，下知有之”，也正如那扮作“尸”的祭主，受祭受福而已。

老子说无为，还没有想出一个可以实行的办法。后世始有法治之说起来，主张虚君的法治。《主术训》说：

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型）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入主之准绳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

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副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

有了这样纯粹客观的法制，贵贱贤不肖都受绝对平等的待遇，诛赏予夺皆依客观的标准，皆不从君心出，这才是“莫从己出”。莫从己出，故“诛者不怨君，而赏者不德上”，这才是“以无为为之”。

虚君的法治，意义如此。

无为的政治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主术训》说：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驢马而服驹駉。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也。因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

桀之力制脰伸钩……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培井之无鼃鼃，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

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守也……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

力矣。

这些议论里很有民治主义的精神。《吕氏春秋》不主张民主政治的理由是因为治乱存亡“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群众人的知识必不如少数贤智之士。《淮南王书》出于百年之后，封建社会已完全崩溃了，屠狗卖缯的无赖都可以建国做将相了，故此书对于群众人的知识能力，比较有进一步的认识。群众人的势力可以推翻秦始皇的帝国，群众人是不可轻侮的。故此书中屡屡指出“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一条很重要的原则。这便是民治主义的基本理论。况且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圣智之所不知，不如小儿女之所素习。所以说：

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高注：鸟头也。许慎注：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主术训》）

故此书又屡屡指出“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的原则，这也是民治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主术训》说：

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榱椽，短者以为朱儒枅椽。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

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歧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

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轻。

这都是说明“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的原则。民治的精神不在有无君主，而在能否使全国的人有各尽其能的平等机会。

民治的第三个基本要义是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主术训》说：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聪明光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

“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便是言论的自由。

民治主义的第四个要义是承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对等的，只有相互的报施，而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主术训》说：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搥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夫风疾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

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稼，必不可之数也。

“相报”的关系即是孟轲说的“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承认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

这是《淮南王书》的民治主义的思想。

道家承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故应该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论调。不幸他们太看重了自然的变化，遂以为可以不用人功的促进，只要能跟上自然变化的趋势，就很够了，故有“常后而不先”的雌性哲学（说详上节论有为与无为）。但《淮南》之书出于韩非、李斯之后，终不能避免战国晚期变法论的影响。故《汜论》、《修务》诸篇多有很明白主张变法的议论（引见上两节）。自然变迁固是事实，但人类的行为最容易习惯化，人类的制作最容易制度化。行为成了习惯，则不喜改革；创作成了制度，则不易变动。外境虽然变迁了，而人类的守旧性往往不能跟着时变走；跟不上时变，便不能适应外境，名为不为物后，其实早已落后了。故“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的一个理想，决不是漠然无为所能做到，必须时时有自觉的改革，自觉地与推移。故庄子的自然变化论必须有韩非、李斯的变法论相辅而行，方才可以无弊。《淮南·齐俗训》说：

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披裘。夫一仪（仪如今言“瞄准”）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异。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

人者至贵在焉尔（王念孙不明此文之事，妄以“为人”二字为衍文，大误）。

“与化推移”全靠有“人”能明白时势已变换了，而又能制作以适应那变换的局面，才够得上称为“与化推移”。故下文又说：

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

这都是说“人”的重要。变化是自然的，而“与时推移，应物变化”却全靠人的努力。

《齐俗训》又说：

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而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衾衽（黑色衣），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刍狗以谢过，土龙以求雨）。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芥而已，夫有（又）孰贵之？

礼义法籍，各有当时之用，时过境迁，便如刍狗土龙用过之后，不过是一块土、一束草而已。此即是《汜论训》说的“圣人制礼

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也说：

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

变法的哲学自然反对崇古的迷信。《修务训》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泻其所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故有符（符，验也）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

这里讥笑那些假托神农、黄帝的人，和那些迷信假古董的人，最近于韩非、李斯的议论。《汜论训》说：

夫存亡治乱（亡者使之存，乱者使之治），非智不能；而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这完全是韩非的口吻了。

《淮南》之书虽然这样攻击“道先称古”的恶习，却又时时

自己犯这种毛病。道家本称“黄老之学”，而黄帝便是完全假托的。《修务训》明白嘲笑那些假托神农、黄帝的人，然而《淮南书》里几乎篇篇有太古圣王的奇迹，无一不是信口开河的假造古史。试举《俶真训》作例：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溷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当此之时……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而知乃始，昧昧楸楸，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

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是故治而不能和。

下栖迟至于昆吾、夏桀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

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心；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阔而觉于寂漠也。

这正是“尊古而贱今”，正是“道先称古”。道家认定一切有皆生于无，故先造为无中生有的宇宙论，以为无形贵于有形；又造为“有衰（等衰之衰）渐以然”的古史观，以为无知胜于有知，浑沌胜于文明，故今不如古，于是有“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的人生哲学了。其实是他们先有了这种懒惰消极的人生哲学，然后捏造一种古史观来作根据。这是古代学者文人的普通习惯，风气已成，人人信口开河，全不知道这是可耻的说逛了。

这样假造的上古史观，人名可以随便捏造，时代可以随便倒置，内容也不妨彼此矛盾冲突，决没有人去追求考证。学者试检《览冥训》说女娲、伏羲、黄帝、力牧一段，《本经训》说容成氏、尧、舜一段，《汜论训》说古圣制作的一段，和上文引的《俶真训》的一段，同是说古史，而全不相照应，最可以想见当日假造古事的虚妄风气，司马迁所谓“荐绅先生难言之”者，其实是荐绅先生所乐道而毫不以为耻的呵！

五、出世的思想

道家思想是齐学，受神仙出世之说和阴阳机祥之说的影响都很大。《淮南王书》中，这两种思想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分两节叙述它们。

《汉书·艺文志》有神仙十家，二百五卷：《宓戏（伏羲）杂子道》二十篇、《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道要杂子》十八卷、《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叙曰：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疑当作求游）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这些书名可表现神仙家的书都是假托于伏羲、神农、黄帝、岐伯

等人的，其方术有步引、按摩、服食芝菌、冶炼黄白以及其他技道，而其要义在于“保性命之真（真即“天”，古真天同音同训，真即天然，而伪是人为），而求游于其外”。

淮南王最提倡道术，他的《内书》叫做《鸿烈》，而《中篇》叫做《鸿宝》，两书本是相辅翼的伴侣书，《鸿宝万毕》之书多说神仙黄白变化的方术，而《鸿烈》之书虽包罗天文、地形以及齐俗治国之道，然而主旨所在实是神仙出世的理论。《要略》篇总括《原道训》的主旨云：

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

这样特别反复叮咛，可以想见著作的主旨所在。《要略》又总括《精神训》的要义云：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

这也正是神仙家的人生观。我们可用《原道》、《精神》等篇作材料，看看那后来风靡中古时代的神仙出世的思想的大致。

《原道训》说：

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纵

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行，可以骤而骤；今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

这里很明显地提出一个出世的理想。这种理想境界，在《淮南书》中有种种说法。如说：

圣人不以人滑（汨乱）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王念孙说：人者，偶也。“与造化者为人”，即上文“与造化者俱”之意）。（《原道训》）

如说：

得道者穷而不慑，达而不穷……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与化翱翔……是故不以康为乐，不以谦为悲，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原道训》）

又如说：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阔而觉于寂漠也……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之间，犹飞羽浮芥也。孰